

← (上接2版)

回。”则是从《海藏楼诗》中作贼,非创语也,可以不论。

近代诗中的西学

前云郑孝胥诗与西方文学之冥契,是比较偶然的,其实除了此种冥契,近代诗中运用西方典故,在那时也是风气。关于此种风气,梁启超在《饮冰室诗话》中曾有批评,已为世所知。另外,梁启超所批评的夏曾佑、谭嗣同等人诗中运用洋典故,即所谓的“亚契欧铅”,也只是比较浅显的例子。

于此,钱锺书《谈艺录》中亦有论及,其所着眼则是从中国诗的艺术角度出发的。钱氏最推崇严复化用西谚的一联,为《复太夷继作论时文》一五古起语云:“吾闻过隘门,相戒勿言索。”称为“喻新句贴”,并且如盐着水,不见痕迹。但若换一种眼光看,就可能要别作论议了。因为,我国传统诗的主流是抒情的,惟此亦仅是事情之一面。而从宋诗开始,中国诗就向学问化发展,即所谓“以学问为诗”,或如清人所云“学人之诗”。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,对这个新趋向感觉不满,提出他的批评,他主张应回到抒情传统,他说:“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,遂以文字为诗,以才学为诗,以议论为诗,夫岂不工?终非古人之诗也。”

严羽的此种针砭,得到后人的许多同情,姑不论其所说之是非,只就其所提的事实言之,则其所谓“以才学为诗”,正是“学问化倾向”,正是宋人之新特点。不妨说,宋人与清人都是有意向此方向发展的。而元明诗则是蕲向于唐人,此即中国诗史的“唐宋之争”之本质。宋诗是对于唐诗的趋避与开拓,是学问化的诗,是中国诗之有效的发展,自然也是成了大功的。中国诗至于宋代,遂不复独以抒情为其特色,而同时加入议论、学问了。其以学问为诗,在清代更得大的进展,在乾嘉时期,其间最突出的代表,为翁方纲,他是考订金石入诗的,当时反对他的人便骂他“错把抄书当作诗”。此一批评,或许是不无道理的,但其昧于古今之变,也是很显然的。到了晚清,此种学问化的倾向更厉害,一时之间,西学也进入中国诗,中国诗中的学问化,又复具有了新趋向、新发展。换言之,中国传统诗之“旧瓶”中,已装“新

酒”。此与印度佛学进入中国后,禅宗兴起,于是禅学精神进入宋诗,其情形是极相似的。

关于近代诗的运用西学,可举一典型的例子,即吴士鉴《咏袋鼠二十韵同樊樊山丈作》。吴士鉴主要是学者,其传世之作为《晋书斟注》,此自为人所知。此外,他还为皇帝讲过《西洋通史》,于西史、西学,下过不少功夫。当然他也是一位诗人。汪辟疆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评其诗“喜用近代掌故及西史事实,能雅能隽”,其语非虚。汪氏《近代诗派与地域》又云:“吴綱斋(士鉴)为识时之俊,喜览译籍,间事篇章,运今入古,差有理致,要皆与康、黄笙磬同音者也。”他有一首咏袋鼠的诗,运用西学新知,可谓极诗家之能事的了,其诗云:

火地穷荒辟,西班牙人初觅得
澳大利亚时,名之曰火地。奇珍袋兽稀。
格卢胫或短,英人韦门道《百兽图说》:有袋之兽,曰更格卢,生于澳大利亚,其形前腿短。以美人潘雅丽《动物学》之说,即袋鼠也。欧白体同肥。欧白生为袋兽之一,生南美洲,形大如猫。牝牡原区类,牝者有袋,牡者无之。攀援善审机。时常攀树搜寻食物。五能殊矫矫,鼯鼠五技:能飞、能缘、能游、能穴、能走。此许叔重之说。中国古书无言鼠有袋者。八月尚依依。初生仅寸许,装于袋内,至七八月时,可以自行。似鹿圆颅耸,如猿信足飞。凌髻度温带,垂须胜寒衣。襁属难离乳,囊探许贮贖。蹻跃知力巨,其足长而有力,恒蹻踞于尾。幽颀问名非。潘氏《动物学》:幽颀产于美国,小兽亦居母之袋。蒲米兰坚韧,潘氏谓土人捕袋鼠,系用湾曲之木,名曰蒲米兰。枞榕树馥郁。美人白雷特《澳洲风土记》谓:澳洲植物园中,枞榕竹榕错置其间,颇形畅茂。盗嫌疑腹硕,穴斗恨身硕。茂葱长河饮,澳洲大河,一谓之茂葱河。巴斯估船归。巴斯为澳洲海疆。雪梨居远近,澳洲首府曰雪梨。露草啮芳菲。韦氏谓袋兽之属,分二种,一系食肉,一系食草。踪辨斑斓采,分黑白围。无条除竹折,有螫莫嘘歔。缀乌方成构,钻蛇敢逞威。皆产于澳洲,见《风土记》。卵真猪箭筒,字岂獭窠腓。西国有袋箭猪,乳哺而卵生,生卵则置诸袋。又鸭嘴猴,亦产澳洲,其腹下有袋,亦卵生,每袋生卵两枚。均见潘氏《动物学》。赤道遥输颔,金环匪降襍。殊形栖桂苑,诡态隐松琦。郭璞图谁补,张华志漫讥。即今征异物,山海陋西驷。

按,此诗见于四卷本的《含嘉室诗存》卷三,全诗之所咏,皆根据于西书,不复为传统之博雅,而为中西融通之新趋势。据此诗,可见近代老派诗人在新方向上的努力。又如大史学家柯劭忞,则以英文入诗,其《严绍光西湖雅集图》开头云:“古来图画难俱述,谁似符头孤列勿。译言摄影。镜中鉴物能留

物,十有三家皆阁笔。”“符头孤列物”,是英语 photography 的译音。此亦为新学人诗之佳例,钱锺书在《汉译第一首英语诗〈人生颂〉及有关二三事》注六十二中提过,不再赘述。

近代诗技巧之新进展

此为最后一点,关于此点,可举律诗之对仗言之。对仗为汉语文学中的特有现象,也是中国诗中的核心技巧之一,在五四时期,胡适等新文学作者最喜攻击的即为此点,此亦古所谓“射人先射马”之意。胡适有句甚谬而有名的话,即谓中国文化中的律诗与小脚、鸦片,此三样东西,是最为糟糕的。其实小脚、鸦片,皆为陪衬语,其用意自是为了攻击律诗。此一谬说,在当日是有大影响的,但是,陈寅恪先生不以为然,在《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》中云:“对偶确为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,而欲研究此种特性者,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所产生之对子。”(见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)无论陈、胡,撇开其持说的是非,实皆已认识到对仗之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技巧,所不同的是,胡是要批倒中国诗,为无对仗的新文学开路,所以就有如此的一个谑虐的话,而陈寅恪则是“中学为体”、要发扬中国文化的人,评价自然反对了。就对仗在律诗中的发展说,前人公认是到了南宋的陆游,则几乎有了令人叹止的表现,南宋末年大诗人刘克庄就早说:“古人好对偶,被放翁用尽。”(见《后村诗话》)其所举的例子有:“子午谷,丁卯桥;一弹指,三折肱;乞米帖,借车诗;虎头,鸡肋;一齿落,二毛侵;岩下电,雾中花。”这在我国古诗人,正为“拿手好戏”。

而在近代诗中,此一传统的技巧,亦有了更进的发展,其代表人物,端推那位大才子易顺鼎。易顺鼎在当日是被王闿运称作“仙童”的,他与曾国藩之孙曾广钧齐名,曾广钧则被称作“圣童”。其七言律诗对仗组织之妙,在当时是公认无人可比的。他自己对于对仗,也有一番极夸口的议论,他的《琴志楼摘句诗话》云:

余自信此集(指《四魂集》),为空前绝后、少二寡双之作。……杜诗亦讲巧对,如“子云清自守,今日起为官”,及“大司马”、“总戎貂”之类。况余诗对仗皆用成语,且不喜用僻典,

而所用皆人人所知之典,又皆寓慷慨悲歌、嬉笑怒骂于工巧浑成之中,自有诗家以来,要自余始独开此一派矣。

又云:

余尝有一推倒一时豪杰之论云:“无工巧浑成对仗,竟可以不必作诗。盖尘羹土饭、人云亦云之语,虽数十万首亦作不完,何必千手雷同,徒费纸墨乎。”

此语固为极端,但亦确有至理在,此不暇详论之。他本人在《四魂集》中的对仗,多有天才的表现,对于近代诗而言,可为一典型。试举数联如:“城郭人民丁令鹤,楼台冠剑子卿羊。”(按,丁、子是干支对)“竟同鹏举死冤狱,无怪马迁修谤书。”“李怨牛恩朋党论,桃生羊死贱贫交。”“边墙遗迹熊经略,幕府高贤鹿太常。”“中朝旧议封关白,上相新闻使契丹。”“忍耻灭吴求范蠡,写忧适越学梁鸿。”“深州未出牛元翼,浪泊难归马伏波。”等等,其中的人名,对仗都是极智巧的。

陈寅恪为清华学生入学考试,而出“孙行者”的上联,意中要人对以“胡适之”,那是仿了苏轼一联诗的对仗,即:“前身恐是卢行者,后学过呼韩退之。”“韩卢”是犬名,叹为“东坡此联可称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”。其实,易顺鼎的此种对仗,在其诗中是层出不穷的,比之苏轼是为远过了,苏轼只偶有一二例,比之陆游犹尚不及,所谓“古人好对偶,被放翁用尽”,在易顺鼎之前,是可以那样说的,但易顺鼎出来后,就要超过去了。也因为这个缘故,已故的思想史学者蔡尚思,在其《中国文化史要论》中概论“文学史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”,于清代之诗人,独推二人,其一即易顺鼎,云“他作诗特长于对仗,就这一点而论,确实是超越古人的”。这意见是不错的。

* * *

最后,对于近代诗成绩的评价,在前人并不乏积极之肯定,有见识的学者,是甚至以为超过宋诗的。如江西诗人欧阳述,在《浩山诗钞自序》中云:“犹记壬寅三月,与文道希(廷式)学士同寓沪上,深夜谈诗,学士举郑公苏龛、沈公子培之句,相与吟味。述因言近贤诗境,似非雍乾诸家所及。”(见《浩山诗钞》,光绪间刻本;按,陈澹然《彭泽欧阳笠笠墓表》云:“尝谓本朝之诗,极古今之奇变。”亦可证。笠侷,欧阳述字)另一位江西诗人曹震,亦

云:“并世诗人,突过乾嘉。”(见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)又皖诗人陈诗《上郑海藏先生》云:“海藏与散原,坛坫峙二派。势若决江河,孰能窥其际。……光宣胜嘉道,二公实振旆。”(见《鹤柴诗存》卷四,一九二四年刻本)皆是。后来的学者,如胡先骕也说:“晚清末季,诗学甚为发达,大家名家辈出”;清末之诗,“远迈康雍、乾嘉”(见《四十年来北京之旧诗人》)。这些皆于近代诗有真确的认识。而就中以汪辟疆所言,为尤能探本:

“晚清道咸以后,为世局转变一大关键。……有清一代诗学,至道咸始极其变,至同光乃极其盛。……在此五十年中,士之怀才遇与不遇者,发诸歌咏,恸时念乱,旨远辞文,如陈宝琛、张之洞、张佩纶、袁昶、范当世、沈曾植、陈三立诸人之所作者,渊渊乎质有其文,海内承风,蔚为极盛。”

并以之与宋诗作比较云:

宋诗承三唐之后,力破余地,务为新巧,大家如东坡、临川,亦复时弄狡狴,以求属对之工,使事之巧,如鸭绿鹅黄、青州从事、乌有先生之伦,已肇其端。南宋诸贤,迭相祖述,益趋新巧。近代诸家,虽尝问途宋人,然使事但求雅切,属对只取浑成。……其尤有进于是者:诗歌一道,原本性情,似与学术不相涉,才高意广与夫刁闻西方诗歌界义者,尤乐道之;或主诗关性情,无资于学。然杜陵一老,卓然为百代所宗,彼固尝言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,又云“熟精《文选》理”。昌黎亦言“徐事作诗人”。是诗固未尝与学术相离也。两宋诗人,承三唐声律极盛之后,独出手眼,别开面貌,其精思健笔,洵足惊人!然尔时作者,惜多不学;……近代诗人,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,流风未泯,师承所在,学贵专门,偶出绪餘,从事吟咏,莫不熔铸经史,贯穿百家。故淹通经学,则有巢经、默深;精研许书,则有馥馥、匹园;擅长史地,则有春海、寐叟;通达治理,则有湘乡、南皮;殚精簿录,则有郎亭、东洲。其专为《骚》《选》盛唐,如湘绮、陶堂、白香、越缦、南海、余杭诸家,亦皆学术湛深,牢笼百氏,诗虽与宋殊途,要足与学相俪,则又两宋诸诗家所未逮也。(见《近代诗派与地域》)

此节所云,特具史家之大眼光,而为诗史的“大判断”,卓识高论,最为可取。其中于近人囿于西诗界义,且亦已有所批驳,故不惮烦而详引之,并以结束本篇云。

(作者为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)